

稽六处立石“颂秦德”者，称作“立石刻”、“立石”、“刻所立石”，不以“碑”名^①，西汉犹然。

先秦时期，立于宫庙以识“日影”的竖石，建于庙门以拴牲口的石柱，竖于墓穴以引棺下葬的木（石）柱，都称作“碑”^②。早期的“碑”是实用器物，不刻文字，东汉始变无字之碑为铭文之碑。汉末刘熙《释名·释典艺》云：

碑，被也。此本葬时所设也，施鹿卢以绳披其上，引以下棺也。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，以书其上。后人因焉，故建于道陌之头，显见之处，名其文，谓之碑也。

最初的碑刻，是在“葬时所设”的碑石上书刻文字“追述君父之功美”的墓碑。龚自珍《说碑》云：“墓有碑，穿厥中而以为窆也，刻文字，非古也。”我们看到许多汉碑的上部凿有穿孔，正是古代引棺下葬碑的遗制。西汉时已有把葬铭刻在石上埋于墓前的葬俗^③，东汉墓碑上的“追述”文字估计是由葬铭衍生而来，可以视为葬铭的扩大，或者说，东汉的墓碑是前代无字碑和葬铭的结合。墓前立碑颂德是古代葬制的大变革，其功用又迹近秦朝的“立石”。

东汉的立碑，复兴了镂于金石的传统。金石之作遂由先秦的贵金贱石一变而为东汉的“以石代金”，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诔碑篇》所谓“庸器渐缺，故后代用碑，以石代金”。

中国的碑制，肇端于冢墓碑，奠定于东汉。当时刻碑铭石盛行于世，敷用广，名目多，宫庙、道桥、闾里莫不有碑。石碑上追述功德的文字当时亦自成一种文体，也名曰“碑”。

二 东汉之立碑风尚与曹操禁碑

东汉的碑刻，墓碑为大宗。为墓主立碑颂德是当时营丧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。东汉中期以来，崇丧厚葬的风气愈演愈烈，王符《潜夫论·浮侈篇》记述^④：

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树，丧期无数。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，桐木为棺，葛采为缄，下不及泉，上不泄臭。中世以后，转用楸梓槐柏椴榑之属，各因方土，裁用胶漆，使其坚足特，其用足

任，如此而已。今者京师贵戚，必欲江南樛梓豫章之木。边远下土，亦竞相仿效。夫樛梓豫章，所出殊远，伐之高山，引之穷谷，入海乘淮，逆河溯洛，工匠雕刻，连累日月，会众而后动，多牛而后致，重且千斤，功将万夫，而东至乐浪，西达敦煌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。

古者墓而不坟，中世坟而不崇。仲尼丧母，冢高四尺，遇雨而崩，弟子请修之，夫子泣曰：“古不修墓。”及鲤也死，有棺无郭。文帝葬芷阳，明帝葬洛南，皆不藏珠宝，不起山陵，墓虽卑而德最高。今京师贵戚，郡县豪家，生不极养，死乃崇丧。或至金缕玉匣，樛梓楸柏，多埋珍宝偶人车马，造起大冢，广种松柏，庐舍祠堂，务崇华侈。

东汉世家大族的厚葬之制，既有盛大的会葬仪式，也有高土厚封、立石碑、树石阙、建祠堂的铺张。这样的遗迹，在山东嘉祥的武氏祠堂陈列馆还能看到。厚葬的规格和会葬的规模，因墓主的官位、声望、财力的大小而异，而厚葬的基本标志是起坟墓、建祠堂、树墓碑。

墓前立碑是厚葬的常制。墓碑的功能在于追述死者的功德，供后人凭吊瞻仰。建宁二年（169年），郭泰卒于家，《后汉书·郭泰传》记载：

四方之士千余人，皆来会葬，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，蔡邕为其文。

《后汉书·桓容传》略云：

（桓）彬少与蔡邕齐名，光和元年（178年）卒于家，年四十六。诸儒莫不伤之，蔡邕等共论序其志，金以为彬有过人者四：夙志早成，岐嶷也；学优文丽，至通也；仕不苟禄，高超也；辞隆从窳，洁操也。乃共树碑而颂焉。

既有身后追慕其功德而刻石立碑者，也有生前刻立功德碑者。翟酺为大匠时，上表修缮太学，“帝从之，酺免后，更开拓房室，学者为酺立碑铭于学云”^⑤。何敞守汝南郡，“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”，置立礼官，不任文吏，以宽和为政，“吏人共刻石，颂敞功德”^⑥。

东汉的立碑，以墓碑最为普遍，今天能见